

生命之光

中

夏衍◎著

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祖籍河南开封，生于浙江杭州。

夏衍是中国著名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

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青年读本

黄音迪题



大众文艺出版社

青年读本

J216.1
44-2
2

生命之光

夏 衍 著

中

大众文艺出版社

从香港回到上海

1949年5月6日，潘汉年、许涤新、我和沈宁一行四人，从香港搭乘一条挂巴拿马旗的货轮到了塘沽。到码头来接我们的是冯弦同志，他和汉年很熟，我和涤新则是初次见面。在海员俱乐部吃了饭，在一家招待所住了一夜，次日就乘火车赶回北京。平津解放还不过几个月，天津街头还是那副败落的样子，但是随处都可以看到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标语，也不时能听到《解放区的天》和《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傍晚到了弓弦胡同15号李克农同志的住处，克农和我自1941年初在桂林分手，一转眼已经八年多了，相见甚欢，不知有多少话要说。刚坐定，克农就叫人来给我们拍照，他说：“我们这些人大难不死，居然在皇帝老爷所住的北平见面了，应该摄影留念。晚上，他设宴为我们洗尘。自从离开香港，我们就听不到时局的消息，所以一到弓弦胡同，就先向克农要当天的报纸，一个“小鬼”拿来一个报夹子，又偏偏没有6日和7日的报纸，好容易才从克农口中知道了“三野”已在5月3日解放了杭州的消息。克农是酒豪，拿出一瓶据说是美国人送给他的陈年威士忌来殷勤劝酒，但我们三个人都不会喝酒，结果是他自酌自

饮。谈了不久前刚从香港回到解放区的民主人士——李济深、黄炎培、郭沫若等人的情况，和与国民党谈判的花絮，他忽然想起似的指着我说，你的“老部下”金山在这次谈判中立了功，详细的情形让他向你们谈吧。久别重逢，话是讲不完的，这顿饭吃到11点钟才散，最后他说，前几天陈毅来电，围攻上海的战役已经开始，你们在北平的日子不会太久，从明天起，你们就别想休息，今晚好好睡一觉吧。

我是平生第一次到解放区，什么“规矩”都不懂，如需要衣物和零花钱可以向后勤部去领，住旅馆、叫汽车可以不必付钱，一切都由“公家”供给等等，好在潘汉年是老手，所以向组织部报到，向中央汇报香港情况之类的事，都由汉年去安排。我只请李克农给我和廖承志通了一个电话，想让沈宁寄住在他家里，以便我轻装南下，承志很高兴地同意了。

第二天，我们就住进了北京饭店三楼（现在的中楼），记得潘汉年住的是303号。（事情也真巧，1955年4月底，潘汉年被捕，也住在这个房间。）

正如克农预料，这之后的日子果然忙得不可开交。为公，我们南下之前，必须接受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为私，我们三个人都想和阔别多年的朋友们见见面，叙叙旧情，和了解一下他们的现在和将来的工作。前者一切都由汉年去联系，过了一天，汉年就初步拟定了一个日程，他说，

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同志都在香山，工作极忙，所以接见的日期要挤时间，由中央办公厅决定后临时通知。恩来同志则在城里，明后天就可能约见，所以还有一天我们可以自由活动。吃了早饭，我和汉年先到中央组织部，简单谈了一些香港的情况，然后又一起到了弓弦胡同，我急于想知道几位熟朋友的地址，以便抽空去拜访，克农就要秘书给我抄了一张郑振铎、周扬、袁牧之、金山、萨空了等人的住处和电话号码的单子。我问他钱杏邨现在哪里，他说钱被黄克诚留住任在天津，但他本人很想回南方工作，假如你想见他，我打个电话要他来看你就是了。当天下午我到前能寺 16 号去找周扬，我和他 1946 年在上海分手之后，也已经三年不见了，要谈的事很多，记得那天谈的主要是当时还在大后方和香港的文艺工作者的情况，因为恩来同志已经决定，要尽快召开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的会师会议（即后来在七月间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所以他要我开一张能出席这次会议的大后方文艺工作者的名单。话还没有谈完，汉年就派车来接我，说晚上朱德同志约我们吃饭。

回到北京饭店，“朱老总”已经在 303 号和汉年、克农、涤新聊天。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被斯诺、史沫特莱描写成传奇性人物的将军，这一天他穿着一身深色粗呢中山装，热情地站起来，像见到老朋友似的和我握手，第一句话是：“早知道你的名字了，不容易啊，你们这些文化人。”我仔细端详着他，平易纯朴，真不像是一位叱咤风云，指挥百

万大军的大将！已经是六十开外的人了（记得 1947 年冬，我曾在《华商报》写过一篇《祝福您，朱总司令》的祝寿文章），但显得意外的壮健、年轻。他请我们吃了一顿很好的、并不比香港差的西餐，饭后喝咖啡的时候，李克农还讲了一个笑话，说国共谈判的时候，张治中将军请共方工作人员吃西餐，饭后他问一个通讯员好不好吃？回答是西餐很好，只是最后的一杯“药”（咖啡）实在太苦，朱德同志哈哈大笑，对服务员说：我们这些人不怕苦，再来一杯苦药。

金山、袁牧之相继来访。金山谈了许多国共谈判中的花絮，及 1946 年接管“满影”的经过。牧之则告我钱杏邨已从天津到京，并已约好次日上午来访。

11 日晚，恩来同志约我们三人到设在后圆恩寺胡同的华北局见面，由汉年报告了三年来在香港的工作，主要是各民主党派在香港召开代表会议的经过，其中有一段是李济深先生离港时的惊险情景。恩来同志对接管上海工作作了很具体的指示，并告诉我们，中央决定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分管政法、统战工作，许涤新协助曾山同志接管财经，我则任市委常委兼文化局长，负责接管文教系统的工作。谈到近 11 点，恩来同志用他的车子送我们回北京饭店，路上，他忽然想起似的说：前两天邵力子和他谈起钱昌照的事，问我钱是否还在香港；我回答：我和钱谈过两次，资源委员会的物资和技术人员他已作了安排，我

离港后由乔冠华和他保持联系。恩来同志说这是一件大事，明天就电告乔冠华请钱早日回来。

12日一早，钱杏邨来访。我于1937年冬离开上海，已和他阔别十二年了，他先在上海办书店，编杂志，写剧本，太平洋战争后他到了苏中抗日根据地，后来又随军到了苏北、山东，解放战争时期他又从威海卫到了大连，1949年东北解放后他才拖儿带女到了天津。经过这一段艰苦的战时生活，他还是精神抖擞，健谈如昔，但是他一再说，老了，手脚不轻便了，其实，他和我同年，这一年都是四十九岁，当然，他在战地跋涉了八九年，备历艰辛，所以我说，你身体上受折磨，可是思想上的收获可比我大得多了。他不忘故人，居然还送给我一本广州出版的我翻译的石川达三的《未死的兵》，和一本桂林出版的《愁城记》，他说这是在大连和天津的旧书铺里找到的。接着，金山、袁牧之来，我们一起到东单的一家小馆子里吃了午饭。下午，接到通知，中央负责同志将在香山接见我们，要我们晚8点以前到香山某一别墅，记得陪同我们去的是王拓同志。

晚10时，毛主席单独接见了我们，主要是听取潘汉年关于香港工作的汇报，当时，正是英国紫石英号在南京肇事之后，所以他问起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我们回答，在国共和谈破裂之前，港英当局还怀有一种“划江而治”的幻想，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想把李任潮留在香港；后来我军胜利渡江，南京解放，他们的态度有了一些改变，我

们公开举行庆祝解放南京的酒会，他们也没有干涉，还让一些“太平绅士”参加了我们的酒会。至于紫石英号事件，发生在我们离开香港之后，所以这之后他们的态度有没有改变，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笑着说：英国人比美国人老练，看来他们是会留有余地，不会把棋走死的。我们请他指示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他说总的方针，中央已给陈、饶发了电报，重要的一点是尽可能完好地保存这个工业城市，不要让国民党实行焦土政策，至于具体做法，可以按周恩来同志给你们的指示办理。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最后对我说，关于文化方面的事，少奇同志最近去天津视察了一下，有些要注意的事，他会具体地和你们交代的。毛主席情绪很好，一直面带笑容，在潘汉年作汇报时，他有几次很风趣的插话，使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也把汉年叫做“小开”。

原先决定在香山住一天，等少奇同志接见，可是第二天一早就接到通知，说周恩来同志决定当天晚上在中南海开会，我们三个人都要参加，所以吃了早饭就赶回北京饭店。周恩来同志约定的时间是晚上9点，所以我抽空就到护国寺附近的麻花胡同（？）去找廖承志，见到了何香凝先生、经普椿和李湄。沈宁在香港时和李湄同在培侨中学念书，亲如姊妹，所以把她寄托在廖家，生活、上学等等，一切都请“肥仔”全权处理。

晚8时，和汉年、涤新一起到了中南海，是勤政殿还是

别的什么殿，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反正这是平生第一次到了皇帝住过的地方，茅盾、萨空了、胡愈之已经先到，接着周扬、袁牧之、钱杏邨、郑振铎相继到达，大家都是熟人，只有沙可夫是第一次见面。大多数人都是久别重逢，而且，除许涤新是经济学家之外，都长期从事文艺、新闻工作，所以对解放后的文化事业，各有自己的抱负和设想，大家谈得十分高兴，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直到恩来同志打电话来通知，说他正在和几位民主人士谈话，可能还要一个小时才能到会，要我们暂时等待，这时看了一下表，才知道已经近10点了。这是一次难得的聚会，每个人都有许多话要说，都有许多事想问，所以尽管劳累了一天，谁都希望有这样一个交换意见的机会。恩来同志大约快12点钟才赶到会场，他先向大家道歉，说他迟到了两个小时，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今天约大家来，是想对几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听听各位的意见，第一是新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中央决定要在政协开会之前，开一个文艺界的代表大会，目的是解放区的和大后方的文艺界会师，加强团结；第二是今后的新闻工作问题，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办报方针，和如何对待民办报纸的问题；第三是上海即将解放，汉年等人很快就要南下，想听听大家对解放后上海文化工作的意见，因为上海是最大的文化中心，情况又比较复杂，今天在座的又都长期在上海工作过，所以希望大家对这项工作提点看法和意见。

对第一个问题，周扬、沙可夫先报告了对文代会的筹备经过，我也把周扬要我开的一张当时还在香港、上海和西南一带的文艺家名单交给了周恩来同志。茅盾、振铎相继发言，谈的都是文学方面的事，钱杏邨作了补充，谈了戏剧和民间文艺的情况。然后周恩来同志讲话，大意是说：这次文代会是会师大会，团结大会，团结的面要宽，越宽越好，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不单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和大后方文艺工作者要团结，对于过去不问政治的人要团结，甚至反对过我们的人也要团结，只要他们现在不反共、不反苏，都要团结他们，不要歧视他们，更不该敌视他们，假如简又文、王平陵还不走，也要争取他们，团结的总方针是凡是愿意留下来的，爱国的、愿意为新中国工作的人，都要团结，都要争取，这是一个“闻道有先后”的问题。今天在座的都是新文艺工作者，新文艺工作者有责任团结旧文艺工作者，可以肯定地讲，旧文艺工作者（一般所说的旧艺人）在数量上比新文艺工作者多，在和群众联系这一点上，也比新文艺工作者更宽广、更密切。当然，新文艺工作者内部，也还有消除隔阂，加强团结的问题。最后，周恩来同志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党中央的决策，少奇同志不止一次和我谈过，要花大气力团结旧艺人的问题，特别是京剧和地方戏艺人的问题。（1978年文化部退回给我的文物和我的笔记本中，居然还找到了一本当时的札记本，以上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是确切无误的。）

谈完第一个问题，已经是午夜1点钟了，暂时休息，吃了宵夜，然后谈新闻工作的问题。恩来同志请胡愈之、萨空了坐在他的身边，以亲切的口吻说，我们过去在山沟里办报，读者对象主要是工农兵和干部，入城之后，情况就不同了，特别是像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这些大城市，为此，要请你们这几位办报有经验的人给我们出主意，提意见。按解放前那样办当然不行，办成解放区那样，读者也会不习惯，达不到教育、宣传的目的。此外，还有一个民办报纸的问题，像《大公报》、《申报》、《新闻报》、《新民报》，以及党领导的外围报纸，这是一个相当复杂、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我们初步的意见是北平、上海这样的地方，还可以保留几家民营报纸，具体办法，想听听你们的意见。国民党的党报，当然要接管改造，但是从业人员，还是要分别不同情况，妥善处理，这个问题要特别慎重，不能鲁莽从事。愈之，空了和我都谈了一些想法，大家一致同意恩来同志的指示。

谈到第三个问题，已经是凌晨两点钟了，恩来同志建议休息十五分钟，到外面去散散步。前一天下了一场雨，中南海的空气，特别凉爽，恩来同志对我说，抗战前你在上海工作了十年，这之后一直在蒋管区，熟悉大后方情况，所以中央决定派你到上海去主管文教工作，全国解放后，你有什么打算？我想了一下说，我在大学学的是电工，还是让我回本行吧。他摇了摇头，笑着说，不行了吧，丢了

二十多年，学过的东西都忘了吧。我争辩说，落后了，可是和全外行比起来，总还可以……他说当然也可以考虑，但是我看你还是搞文化、新闻界的统战工作为好。回到会议厅，接着谈上海解放后文化——主要是文艺方面的问题，周恩来同志先让潘汉年讲上海的一般情况，和我们在香港时对这一工作的设想和布置，例如党内通过刘长胜，党外通过张骏祥，让地下党和进步文化界安排的“应变”措施等等，我作了一些补充，振铎谈了必须大力保护博物馆和图书馆的问题。时间已经不早了，来不及详细讨论，我记得周恩来同志作结论时只讲了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总的方针一定要严格按照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办事，一定要谦虚谨慎，要学会我们不懂的事情，对文化教育等等方面，上海是半壁江山，那里有许许多多学者专家，还有许许多多全国闻名的艺术家、名演员，所以要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他问杏邨和我，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是不是都在上海，你们到了上海之后，一定要一一登门拜访，千万不要随便叫他们到机关来谈话，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要比你们新文艺工作者大得多；二是除旧政权的“留用人员”外，各大学、科学单位、图书馆、博物馆等等的工作人员，除极个别的反共分子外，一律让他们继续工作，维持原职原薪，这样做可能有人反对，但一定要事先做好思想工作；三是对一切接管机关，必须先作调查研究，摸清情况，等大局稳定下来之后，再提改组和改造的问题，请你们把这

个意思告诉留在上海的地下党同志和进步民主人士，他们在沦陷时期吃了苦，受了委屈，但解放后千万要以大局为重，不要计较个人恩怨，总的一句话是要团结，要安定。讲完了这三个问题之后，他站起来走到振铎身边，对他说，对于保护文物和古籍问题，今天来不及讨论了，请汉年同志掌握，我相信陈毅同志是会妥善处理的，等政局稳定了之后，你可以到上海去看看，出点主意。

散会之后，回到北京饭店，已经快天亮了，刚睡下不到几个小时，金山闯进门来把我叫醒，说他已经约好了几位戏剧界的朋友，同到中山公园的一家餐馆去一叙，这当然是不能推却的，可是当我穿衣洗脸的时候，钱杏邨也来了，他说你好容易到了北平，不久就要走了，总得到琉璃厂去看看，当时我对书画、碑帖之类完全不懂，也没有兴趣，就把他拉在一起，到中山公园去喝茶，闲聊了一阵。

少奇同志在什么地方接见我们，我已经记不清了，谈的时间不长，主要谈的是政法、经济方面的事情。我记得他问潘汉年，青红帮会不会像1927年那样捣乱，潘回答说，他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有联系，1948年在香港，汉年和我还去看访过杜月笙，我们离开香港之前，杜月笙曾向我们做了保证，一定安分守己。又说，据他了解，黄金荣那帮人也不会闹事。少奇同志要潘汉年告诉陈毅、饶漱石，先不动他们，观察一个时期再说。临别的时候，少奇同志忽然想起似的对我说，他对天津解放后禁了一批旧戏很有

意见，他说，对京戏和地方戏，先不禁，禁了戏大批旧艺人就会失业，就会闹事。旧戏宣传封建迷信，但我们也不怕，它宣传了几百年，结果还是共产党得了天下，戏剧要改革是肯定的，但不要急，你们要抓大事，这些事可以放一放，等天下平定了再说。

我们于5月16日乘火车经津浦线南下，这时已经不只我们三个人，而是一支“队伍”了，和我们同行的有盛丕华先生（后任上海市副市长），他的儿子盛康年、以及周而复、一位人家都叫他杨秘书的年轻人，和五六位我不认识的民主人士。为了我们的安全，中央还派了一班警卫战士。盛丕华先生1946年我在上海见过，是早已和地下党有联系的开明绅士，那位杨秘书不大讲话，也没人给我介绍，看样子就是一个颇有教养的知识分子。我们坐的车厢是旧式头等车，附挂在一列货车的后面，铁路刚修复，走得很慢，颠簸得很厉害，沿途不停，第二天到济南，有十来个人在车站迎接我们，为首的是当时山东省省长康生，一下车他就和汉年热烈拥抱，潘把我们向他一一作了介绍，他握着我的手说，还记得吧，1928年我们在上海见过，那时我叫赵容。赵容这个名字我是知道的，当时他先是闸北区委书记，后来又当了中央委员，但我还是记不清楚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他。下了车，才知道前面铁路出了事故，要在济南休息一天，康生很客气地陪我们到了车站附近的一座洋楼安顿下来，原来这儿是当时省政府的办公楼，据说马歇尔

调解时期就在这儿和中共代表团谈判过。房子很宽敞，每人一间客房。康生和潘汉年很早就在一起工作过，1936年又在莫斯科见过面，加上还有盛丕华这样一位党外贵宾，所以康生晚间设盛宴为我们洗尘。他对那位杨秘书非常客气，吃饭的时候拉他坐在他的身边，后来潘汉年告诉我，原来他是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饭后，我们这批人在火车上颠簸了一天，都已经有了倦意了，可是康生还给我们准备了一场京剧晚会，演的什么戏，早已忘记得一干二净了，但还记得这个剧团叫“新生剧团”，是济南解放时从国民党军中俘虏过来的。

在济南耽了一天半，又继续乘车南下，可是到徐州，前面路轨又出了问题，据说不久就可修好；于是只能在车上干等。我和潘汉年、盛康年在月台上散步，忽然看到一张徐州市政府的安民布告，后面的署名是市长曹获秋。获秋是“社联”盟员，汉年和我都和他有过工作关系，要是他知道我们在车站上啃大饼，他也一定会像康生那样招待我们吧。火车越向南走故障越多，停停走走，直到23日晚才到丹阳。杨帆（他当时是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带了一批人来迎接我们，把我们安顿在一处临时招待所之后，杨帆陪了汉年、涤新和我三人到三野指挥部所在的一座小洋房去见陈毅同志。房子不大，但花木扶疏，像是一家地方绅士的别墅。我们在小会客室内刚坐定，穿着黄褐色军服，剃了光头的“儒将”就从内室出来和我们热烈握手，

这就是淮海战役中围歼了五十五万国民党军的陈毅同志。不等杨帆介绍，他就大声地说：“等了你们几天了，好在你们都是老上海，不需要给你们介绍上海情况。”5月下旬，南方已经很热，他拿起一把扇子边扇边说，你们从北京来，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人事安排，你们该已经知道了，我们印了一本小册子，主要是入城纪律和党员守则，可以看看，中央对你们有什么新的指示，倒想听你们讲一讲。接着，潘汉年向他汇报了毛主席和恩来、少奇同志对我们所作的指示，谈话中，机要员进来请他接电话，他到内室去接了电话回来，对我们说，我们已经包围了吴淞，国民党在上海只有几个军的残兵败将，已经没有什么仗可打了，我们随时可以拿下上海，我们在这里踏步不动，主要是对接管干部做点思想工作。上海是个好地方，又是一个烂泥坑，花花世界，冒险家的乐园，乡下人进城，会眼花缭乱的，你们得分出点时间来，分别对你们分管的干部讲讲上海情况，凡是要注意、要提防的事情，你们讲比我去讲更好，你们有感性知识。谈了不到一小时，有几次紧急电话向他请示，他站起来说：“好，我去示他一下，你们先休息吧，刚才聂凤智来电话，可能明天就要开拔，今晚好好睡一觉吧。”杨帆陪我们出来，丹阳地方不大，可是在这里聚集了成千个接管干部，一上街，走几步就会碰上一个熟人，我们在十字路口分手，杨帆陪了潘汉年去见饶漱石和舒同，许涤新去找曾山，我在路上就碰到了黄源，知道于伶也已

经从上海赶来了，我们就一起去看于伶，很快，文教接管委员会的干部就聚在一起了。华东局决定，文教接管委员会由陈毅任主任，我和韦恂、范长江、钱俊瑞为副主任，原来的决定是范长江负责接管新闻、广播、出版，钱俊瑞负责接管教育，我分管文艺——主要是电影，但是这时范长江和钱俊瑞都还留在北平，所以文管会先由我实际负责。文管会的领导班子是于伶、黄源、陆万美、钟敬之、向隅，还有一些人埋伏在上海，如唐守愚、姜椿芳、徐韬等，据黄源说，他们在丹阳已经学习了一个月，并根据刘晓同志和地下党提供的资料，对要接管的单位已经有了大致的分工。这个班子来自五湖四海，大多数人我熟悉，但也有不少人是第一次见面，由于陈毅同志说可能明天就要开拔，所以来不及叙旧和相互介绍，我就抓紧时间扼要地传达了一下中央领导同志对接管文教工作的指示之后，就说，我离开上海已经三年了，而这三年中变化很大，肯定会有许多新情况不了解，加上要我动动笔，编编报，勉强还可以，但完全没有行政工作的经验，所以对这样一个新任务，接管这么一个大摊子，实在感到力不胜任，再加上范、钱两位一时不能赶到，所以只能依靠大家帮助。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了舒同，他是三野的政治部主任，内定华东局宣传部长，所以这不是礼节性拜访，而是工作上、业务上的报告请示。他对我很客气，也问了对接管文教工作中中央有没有新的指示之类，谈了约一小时，只是我